



■ 曾伯早出而作，每個早上奔走於各層垃圾房。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

工作屋邨曾有人中招 易沾百家毒

面對病毒缺防護裝備 清潔翁心慌

抗擊新冠肺炎

「疫境下，他們怎麼過」

不少人更在沒有足夠防護裝備下頂着惡臭、大汗淋漓地收拾垃圾。手推車所到之處，大家退避三舍，但他們不以為忤，有時更要冒險為大廈最多人接觸的門把、掣掣、玻璃窗消毒。香港文匯報記者跟隨清潔工曾伯（化名）「倒樓」，了解他們工作實況，及在「疫境」下如何掙扎求存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

米色「Cap帽」、鮮藍色短袖制服、白色勞工手套、一雙有點點舊的黑色水鞋，是清潔工人曾伯的「日常裝備」，新冠肺炎殺到，他每天會獲發口罩一個。在何文田愛民邨「倒樓」約7年的曾伯，雖已達古稀之年，但身體尚算健壯，看來只有五十來歲。

他每天早上從邨內其中一幢大廈的18樓走到2樓，將每層的垃圾車拉到各層垃圾槽，再將車內垃圾逐袋扔進垃圾槽口；待每層的垃圾均經直槽到達地面垃圾房的大型垃圾箱後，再將滿滿的垃圾箱推出去，等待垃圾收集車前來處理，整個工序稱為「倒樓」。

市民少出街 外賣多垃圾

曾伯從衫袋掏出垃圾槽鑰匙，打開垃圾槽的門，一腳踏在斜斜的垃圾槽口，讓垃圾車保持傾斜。他彎着腰，把車裡的垃圾一袋一袋地扔進槽口。疫情期間，市民外出用餐的次數減少，不少人更會在周末選擇叫外賣，「每逢星期一二，廚餘和餐盒之類的垃圾就會比平日更多。」

翻出車裡的垃圾，有些垃圾袋沒有束好，沾有蛋白的雞蛋殼、還剩幾口未飲完的飲料鐵罐等垃圾掉了出來，看着眼前的垃圾，空氣裡的酸臭味似乎變得

更濃烈。曾伯無奈地表示，「倒垃圾最討厭就是摸到濕漉漉的東西，餽水、液體等就最噁心。」

垃圾內隱藏着無數細菌和病毒，新冠肺炎病毒的「存活率」奇高，更不知道食物殘渣是否藏有確診者的病毒，「這條屋邨曾有人『中招』，當時我們也非常害怕！」雖然對病毒抱有恐懼，但他也只能咬緊牙關，堅持逐層處理垃圾。

一日一口罩 全職就不夠

「這個行業，怕遲還就做不下去。」曾伯語氣平淡地表示，他們每天獲發一個口罩，「每天一個口罩對半職工人而言，尚且足夠；但對於全職工人來說，就不太夠了。」

他期望政府能提供足夠口罩予前線員工，以保障他們的健康，但之後又喃喃說：「習慣就好……」

在「倒樓」期間，另一名負責「掃樓」的羅嬌嬌主動來幫忙開門、倒垃圾。曾伯指，「我們互相幫忙，當做義工。」羅嬌嬌在過程中會細心地把鋁罐撿起來，然後拿去賣掉，一個一毫，「平常一個早上大概能撿到百多個鋁罐，大概能換到十塊錢。」能多賺一角幾毫，已夠他們樂一陣子。

員工年齡偏大 無新人肯入行

好不容易完成「倒樓」，曾伯回到小小的清潔工休息室。當中坐着兩三個聽不懂粵語的清潔工人。「她們是尼泊爾的，有了她們加入，現在人手才僅夠。」

曾伯指，這行業人工待遇不高，加上工作環境惡劣，屬厭惡性行業，前景如何，可以想像，一般只有上了年紀的人或新來港人士才會入行。

一個有十多幢樓的公共屋邨，所需的清潔工人遠多於一般市民的想像。曾

伯指，他們組一共四五十人，「掃地、剪草、澆花、洗樓、倒樓等，每個人崗位都不一樣。」他慨嘆清潔行業人手緊張，員工年齡偏大，除了他年屆71，不少工友都已經七十來歲，「他日我們退休，就沒人會入行了！」

由於曾伯經常要將垃圾扔進槽口，過程要不停俯身、站立，對腰椎、膝蓋負荷極大，「蹲久了起來就頭暈，腰骨痛不在話下，甚至手腳都會抽筋。」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

社會小人物 為城市服務

記者手記
哪怕將垃圾房洗得多乾淨，空氣依然充斥着一股酸臭味。曾伯翻開一個垃圾車蓋子，裡面空蕩蕩，只是內壁仍黏有一些根本無法洗掉的污跡。

他說：「這些都是洗

乾淨了的。」站在防疫最前線的醫護，遵守着最高規格的衛生標準，我們仍會為他們捏一把冷汗，因為他們終日與病毒搏鬥；然而曾伯年逾七十，面對着堆積如山的垃圾，當中暗藏病毒、細菌，卻沒有太害怕，言談間只有「為搵食頂硬上」的堅韌。

毫無疑問，清潔工的入行「門檻」遠

遠低於醫護行業；但無論是醫生、護士，還是清潔工，他們都在為公共衛生流着汗、咬緊牙關——無論他的初衷是為了懸壺濟世，抑或只是為了「搵兩餐」。

「職業無分貴賤」是一句老掉牙的話，然而當我們看見掃街、倒垃圾的清潔工，又有多少人在想，他們正為我們的城市服務？

此篇訪問無意謳歌，甚至是神化清潔工友，只是想告訴大家社會有太多如曾

伯一般的「小人物」。

他們也許沒有宏大的理想，很在意每個月能賺多一角幾毫、家中有多少口罩存貨；他們也沒有刻意爭取光環，只是希望外判公司可以多加體諒，可以提供消毒、衛生用品，加強健康的保障。

當我們拿着垃圾卻找不到垃圾桶時，或許能暫時把它塞進自己的口袋，帶回家好好處理，讓我們的城市多一分衛生，也為清潔工友幫上一點忙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



記者手記



■曾伯每天都要把條狀垃圾用竹籃運到地面的垃圾房。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



■曾伯「倒樓」後，需要在位於地面垃圾房的槽底收集各層垃圾。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

清潔用品靠自備 環境惡劣人工低

麻煩住客不體諒 搵食唯有頂硬上

由於工作太辛苦，曾伯只能做半職清潔工，每天早上堅持做4小時，「全職月薪有11,507元，半職的人工只有一半。」曾伯的老婆在大學做清潔，加上他領取的「生果金」，兩口子住在坪石邨，家庭收入尚可應付租金及日常生活開支等，但這微薄的薪金，一旦身體不適，要花錢看病，即捉襟見肘。

工作環境惡劣，更要面對新冠肺炎的威脅，但公司並沒有提供消毒液、肥皂等用品，要麼由工人自備，要麼就得撿回來。在工人休息室裡，滿頭白髮、年逾七旬的陳婆婆從櫃裡拿出一瓶自備

的消毒水，提着「私伙」水桶，正準備去洗澡。曾伯不禁笑言，「她有潔癖，每天要洗幾次澡。」

制服僅兩件 冬天也短袖

工作結束後，曾伯把休息室的大門掩上，迅速脫掉制服，換上另一條褲子，去到洗垃圾車的大房間，開水喉沖了一下地面，「地面有時候有玻璃碎，要先把地方沖乾淨，才能洗衣服。」他只有兩件制服，「其他公司員工的制服有風襪、長袖，而我們只有短袖，冬天只能在裡面多穿一些」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

子熱水煲、風扇等家電。曾伯提到，休息室本來空無一物，「我們見這些東西還能用，就撿回來了。如果我們看見一個更好更大的雪櫃，就將原有的換走。」

提及工作上遇到的麻煩事，曾伯也不禁發了一陣牢騷，「有個住客特別麻煩，連警察都買佢怕……」他口中的這個麻煩住戶，老是檢查垃圾車有沒有倒乾淨，「若有一次讓她發現你倒得不夠徹底，她就會不停往房署投訴，直到你離職。」清潔工陳婆婆亦提到，「她兒子還幫着她，說什麼『阿媽開心就得』。」

「你係咪收咗人工？收咗人工就要做！」面對某些不體諒清潔工的住戶，只能忍氣吞聲，「要搵食，點都要頂硬上。」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